

（二〇一八年六月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悲剧人生】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张玉钟
【文献资料】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信（摘要）	徐景贤
【亲历者言】	我逼迫林杰制造《声明》	赵建文
【一家之言】	我在文革漩涡中（选载之四）	聂元梓
【编读往来】	读者指正	栗奇程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悲剧人生】

我知道的李庆霖上书毛主席的一些情况

• 张玉钟 •

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小学教师李庆霖给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写了一封信，反映他儿子李良模上山下乡中屡遭苦难的状况。信寄出4个多月后的1973年4月25日，毛主席亲笔给他回信，并给他寄了300元人民币。随即李庆霖的名字全国家喻户晓。他的这封信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两千万知识青年的生存状况。当年，我才23岁，也是一个下乡知青，比较幸运的是已在莆田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工作；这是个专门从事新闻报道的机构。由于工作关系，我多次陪同新华社记者采访李庆霖，是莆田地区内第一个知道毛主席回信的人，也是因此事第一个接触李庆霖的人，因此我有许多第一手资料。后来我读了许多关于此事的报道文章，其中不少与事实有出入，现在此事早已成为历史，我想把许多还鲜为人知的情况及细节，归纳为几点解密于此以飨世人。

一、李庆霖的信是如何到毛主席手上的？

1973年4月29日，也就是毛主席给李庆霖回信的第四天，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突然来到莆田地委，点名要我陪他去办一件事（地委宣传部通联站共9个人中只有我一个莆田人，他每次来莆田采访多数由我陪同）。这一次他非常神秘，他是上午到达的，下午要我带他去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我问他什么事？他一再对我交代要保密，然后告诉我，这个学校有个教师叫李庆霖，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不仅给他回信，还给他寄了300元钱；毛主席回信的内容他记录在笔记本上念给我听：“李庆霖同志，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他还说这是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新华社的，要先派记者来调查，连福建省委领导都还不知道呢。

下林小学离城关只有两公里左右，下午我带赖玉章坐了一辆人力三轮车到了这个学校。我们点名要见李庆霖，当时他还在上课，我们就在办公室等。下课后李庆霖见到两个陌生人

找他，神情很是惊异。待办公室没有其他人后，赖玉章开口问他：“你有没有给毛主席写一封信？”我在一旁没有说话，一直注意观察他的表情，我记得他沉默好久都没答话，他在心里估摸到底是福还是祸。赖玉章问话后微微笑着，他心中觉得应该是好事降临，于是他重重地点了点头。接着赖玉章说：毛主席看到你的信还亲笔给你回了，并给你寄了300元钱。他听了脸上并没有露出笑容，而是紧张而严肃地反问：“毛主席是怎么回的？”赖玉章给他念了信的内容，这时我看到他脸上渐渐舒展开来，溢出兴奋之情。赖玉章说这件事还要十分保密，并告诉他自己住在兴化宾馆某房间，约定晚上到宾馆细谈。晚上7时多，李庆霖到了赖玉章宾馆房间，就我们三个人谈了两三个小时一直到夜深才离去，这次谈话（事实上是采访）令我终生不会忘记。

李庆霖那天晚上已经没有了白天那种拘谨严肃的神情，表现得非常高兴，他说话慢，语调也比较低，但完全打开了话匣子，从他家历史身世、儿子上山下乡遭遇的苦难，到自己如何想给毛主席写信，都说得非常详细。我们提出了最感兴趣的一个话题，问他信是如何寄出去的？原来那一天他在一张竹桌上写好了信，接着就写信封“毛泽东主席收”，就拿出去邮寄。当时莆田城内只有一家邮局，离他家西北向。他一边走一边心里在打鼓，倒不是怕闯祸，主要是担心主席收不到，因为这之前他也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却石沉大海，他想可能是周总理没收到，那主席要看到这封信就更难了。走到半路，他脑子突然闪出一个念头，他经常看到报道毛主席接见外宾，外交部王海蓉都在场，何不如把信寄到外交部王海蓉收，请她转交给毛主席。他想到这里心里一阵激动，就马上折回家中，就在信封上写外交部王海蓉先生收。因为我年纪轻古文基础差，我马上问他，王海蓉是女的，怎么称“先生”？他温和地笑了笑说：“先生”是一种尊称，男女都可以用（对女士也可称先生我就是这一次听李庆霖说的）。他还说他也给王海蓉写了一封短信，说自己家碰到天大困难，请她一定把信转给毛主席。然后就把给毛主席的信套进去寄走。因此可以断定，这封信是王海蓉收到后看了一定很感动，亲手转交到毛主席手上的，非此这封信也就夭折了。我想全国知青和家长真的应该感谢王海蓉先生！

我看到的所有文章包括有的采用李庆霖自述的，都说新华社记者赖玉章是5月1日到莆田找李庆霖的，这是记忆上错误，准确的是4月29日。过了几天到5月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了福建省委，省委通知了莆田地委和莆田县委。当时的县委书记是部队干部叫刘功，激动地对着电话筒高呼毛主席万岁，后来许多媒体都写到这个细节，这是确实的。5月6日，李庆霖收到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寄来的毛主席回信的复印件，随后也收到了300元钱。从此开始，这件事就在莆田城内传开来了，李庆霖出名了。

二、李庆霖是怎样性格的一个人？

李庆霖1929年出身在莆田县城关一个极度贫困的贫民家里。他祖父当过乞丐，父亲很小就被送到一家首饰铺当学徒，以打制妇女首饰为业，但因生意萧条，铺子关门也到乡下乞讨，后来患上精神疾病，上吊自杀未遂致残，年纪不大丧失了劳动能力，全家人就靠母亲打小工、当保姆维持生计。尽管家徒四壁一贫如洗，母亲却咬着牙节衣缩食硬撑着供李庆霖读书，而李庆霖的妹妹上不起学，8岁就被送到一家草编店里学编织草帽草席。1944年福建省立仙游师范来莆田招生，免收学费还供应伙食，李庆霖便去报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录取了。入学那一天，母亲挑着行李陪着儿子，从很早上路，一直走到下午才到学校。李庆霖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发愤刻苦，熬了4年到1948年毕业，分配到莆田县黄石镇沙坂小学，月薪为140斤大米，生活很清苦，但总算有一口饭吃。解放后，他被政府留用继续任教。1951年，22岁的他与学校所在地的农村姑娘张秀珍结婚，婚后5年中长子良模、女儿良培、次子良雄相继出生。1956年全家搬回城关老家居住。1958年他被调到沿海忠门公社前坑小学担任教导主任，并担任一个毕业班的班主任。才3个多月就初考，

这个班因成绩太差没有一个考上初中。当年正逢大跃进时代，时兴“插红旗、拔白旗”，莆田县教育局召开小学庆功大会，李庆霖等一批升学率低的班主任被宣布作为“白旗”拔掉，同时他被免去教导主任职务，工资由每月50·5元降为42·5元。这一次处分在他心里刻下了一道永远抹不掉的伤痕，直到他出名后在各种场合都愤愤不平不厌其烦地谈起。

一辈子艰难曲折的经历，使他学会了坚强。看起来文弱书生，心里却潜藏着一种敢于与命运抗争的强者精神。正因为这样，他遭遇儿子上山下乡中的困难，敢于向各级领导机关反映，敢于给周总理写信，没有收到回信也没灰心，反而进一步想到给领袖毛主席直接写信。也许是他从小刻苦读书积累下的扎实基础，他的文字功底令人佩服。他出名后，红旗杂志通过地委宣传部约他写一篇谈反潮流的文章，这个任务部里就交给我去转达，过几天他把稿件交给我邮寄到北京，我把稿件从头到尾看了，不久红旗杂志刊登出来，我又认真看了，几乎全部是原文，编辑基本没有改动，这当时就让我这个拿笔杆为生的心诚服。现在我回忆这件事，并非说他所包含的政治内容，而是说他文字功底和朴实文风，有一种很大的可能让毛主席也被他所感染。当年把毛主席复信和李庆霖的信作为中共中央文件（中发〔1973〕21号）向全国传达，印发出来的是他原原本本的信，一个字没有改动，原文中就没有一个错别字，我想就是现在任何一个大秘书要做到自己一次性起草的文章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而不需要改动一字的，恐怕是极少的。毛主席自己一生讲究文字，看到这样一封信怎不会被感动？而且全信朴实无华，让人读了觉得真实可信，却也不乏幽默感，比如“呼天不应，叫地不灵”，“只好大胆地冒昧地写信到北京‘告御状’了”，这些话很符合毛主席喜欢的语言风格。还有从全信内容看，李庆霖虽然把上山下乡中的困难写得很尖锐，但敞开的是一种真诚的心怀，从头到尾没有一句否定毛主席亲自倡导的这上山下乡运动，甚至你读不出信中有对整个上山下乡运动的怨恨情绪，这也不能不令伟大领袖感动！所以，毛主席在对八大军区司令员谈话中，赞扬李庆霖那信“写得相当好啊”。他看了三天才下决心回信。他还建议把这封信编入学生课本中。

三、李庆霖政治上是怎样大红大紫起来的？

毫无疑问，李庆霖“告御状”促使了中共中央高层高度重视和全面调整知青政策，直接使全国两千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也包括回家乡的知识青年）的命运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这在今天看来仍然是一件大好事。随着中共中央〔1973〕21号文件的贯彻落实，李庆霖成了全国知青及其家长心中的神圣人物。因为他为广大知青办了一件天大的好事。

但是历史的发展往往难以预料，李庆霖出名之后很快就在政治上也大红大紫起来，这当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毛主席对他器重有加。毛主席除了给他亲笔回信并寄钱外，还特地对他政治上的发展也嘱为安排。回信后的两个月，约在1973年6月下旬，福建省委和莆田地委、县委都得到了正式渠道传来的一个内部消息：毛主席对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说：要问一下福建的李庆霖是不是党员？如果是党员，可考虑推选他为“十大”代表；如果不是党员，有入党要求，可吸收他入党并参加“十大”，如果没入党要求，可让他出席“四届人大”。毛主席对一个普通的小学教师的政治安排说得如此细致而具体，这令各级领导感到极大震动和高度重视。但据我所知，当时领导层内部都在紧张商讨如何落实毛主席的指示，却没有一个领导正面向李庆霖透露。因此他本人对此毫无所知。当年身兼福建省党、政、军一把手的韩先楚接到毛主席的这一内部指示后，即把李庆霖召到福州亲自接见，但也并没有当面说出毛主席的指示，只是鼓励李庆霖说，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出来，包括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李庆霖就向韩先楚司令员提出两件事，一件就是上面说的1958年他被插上白旗受处分，他要求给予平反纠正；还有一件是他妻子曾经是国家正式职工，困难时期被辞退，要求给她恢复一份正式工作。这两件事韩先楚都认为合理很快就解决了，李庆霖被调到莆田全县最好的一所小学即东方红小学（现为实验小学）担任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

还补发了从1958年到1973年被降低的工资，妻子也被安排到莆田第四中学当正式职工。

这是李庆霖出名后短短数月内实现的两项要求，李庆霖心里已经很满足了，对于入党要求他心里却没有想到，因此一直没有提出来。最早带来毛主席回信消息的新华社福建分社记者赖玉章，那一段经常来莆田追踪采访，他对李庆霖还没有提出入党要求心里很焦急，他对我说：小张，毛主席很希望李庆霖参加十大，眼看十大就要召开了，但李庆霖还不知道提这个要求，官员们可能不好当面问李庆霖这件事，你小青年干脆给他明确提一提，没关系的。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就应允了赖玉章，一个人到了仓后路居仁巷15号李庆霖家，因为已经多次接触很熟悉了，我就开门见山问他对组织上还有什么要求？他说省地县领导已经解决了他的两件事了，孩子在农村的困难，全国都在解决，相信也会好转的，他说他很满意了。我看到谈话还不能进入有关入党的主题，就索性问他，听说毛主席有对汪东兴说了一段你的事，你知道了吗？他说没有人告诉他。我就把具体内容说了，他听了非常惊讶兴奋，问我怎么办？我说入党要求必须本人有这愿望并自己提出来，别人不好代替，你要赶紧向组织上提出申请。他还问我一些如何申请的具体事项。第二天他就向莆田县委写了入党申请书。我看到许多文章都说李是在7月1日写的申请书，但据我回忆，写申请的时间应在7月中旬。莆田县委接到李的申请后，马上报告了地委和省委，接着各级领导及组织部门内部开始为李的入党紧张运作，进行内查外调，但最终没有在党的“十大”召开前解决李的入党问题，当然李就失去了参加“十大”可能受到毛主席接见的机会。拖延解决李庆霖入党问题，主要原因是在调查中发现敌伪三青团档案中有一份李在仙游师范读书时全班同学的名单，这份名单中有的名字前面打勾，有的没打勾，分辨哪一种是三青团员费了一些时间，到确定李不是三青团员而决定发展他人党，时间就拖到“十大”之后。翌年即1974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反对当局的这一派就把这件事当做当局打击迫害李庆霖的一大罪状，认为是当局怕李庆霖去参加“十大”受到毛主席接见说出对当局不利的话而故意设置障碍。李庆霖本人也有这种看法，这是他后来直接跳出来反对当局领导的起因之一，并多次为自己最终未能见到毛主席表示遗憾。

李庆霖第一次在全省公开“大出风头”是1973年7月2日，省委在福州市召开群众大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21号文件、学习毛主席回信和李庆霖信件。这之前省委领导也已接到毛主席对汪东兴关于李庆霖政治安排的谈话内容，因此省委高规格邀请李庆霖来福州出席大会并讲话。没想到平时沉默寡言的李庆霖口才不一般，他不用讲稿侃侃而谈约一个半小时，开头从学习毛主席回信的重大意义，说到他为什么给毛主席写信，后半部分他话锋一转说：“当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给我写信的事在社会公开之后，我们莆田社会上产生了一股不能小看的政治压力，企图对我倒咬一口，把此事全盘推翻。我想有必要说它一下，让我们共同来提高对路线斗争的认识，也许有一点好处。”接着他讲了几个具体反对他的事，却上纲到两条路线斗争高度上来，这意味着李庆霖开始公开走上政治舞台了。但这一次他只讲到反对他的有关工作人员，矛头还没有指向当局领导层。

随后，在李庆霖入党问题上虽然拖延了一段时间，但在仕途上却接连步步高升，在担任东方红小学领导小组副组长（副校长）后，又被任命为莆田县教育局副组长（副局长）、莆田地区知青办副主任、福建省高招办副主任。虽然错过了参加“十大”机会，各级领导还是不敢违背毛主席的政治安排，推选他出席了四届人大，并当选了四届人大常委会常委（如今是正部级的待遇），还被任命为国务院知青领导小组成员。至此，李庆霖的政治生命走到了顶峰，真可谓大红大紫。

四、李庆霖最终成为悲剧人物的原因何在？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李庆霖很快受到关押批斗，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虽然获得减刑，但也被关押到1994年3月才提前出狱，回家后贫病交加到2004年2月凄惨去世，最终成为了一个大起大落的悲剧人物。客观公正地分析，应该说造成他悲剧绝不单是他个人原因，主要是“文革”的时代悲剧促成了他个人悲剧。

李庆霖被卷入政治漩涡关键的时间点是1974年初开始的所谓“批林批孔”运动。莆田地区当时派性斗争非常激烈，在全国都是有名的。李庆霖1973年出名后那一段，虽已开始走上政治舞台，但还没有参与到两派斗争中，经常说到的只是反对他给毛主席写信的一些人和事，更多谈到的是社会上和党内的不正之风，他最恨的是“走后门”，他当省高招办副主任期间就不顾情面顶住了一些领导干部子女走后门上大学的事，而且还带头把自己的次子李良雄又送去上山下乡，这在当时干部群众中都是认可并传为美谈的。

但在李庆霖有了一系列的官位头衔并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发言影响力之后，“四人帮”就从他身上看到可以利用的优势，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就把他“包装上市”，《红旗》杂志约他写了谈反潮流的文章，“四人帮”随即把他与辽宁省交白卷的张铁生相提并论，树为“北张南李”全国两个“反潮流”的典型，制造了强大的舆论氛围。后来有人说，江青曾接见过他，这我没听他说过无法证实，但他亲口给我说过，他到上海时马天水、徐景贤接见了并大肆鼓励他“反潮流”。李庆霖也就在这种舆论的吹捧下，头脑发热飘飘然起来并与日俱增。

接触过李庆霖的人都会觉得，他一副文弱书生模样，全身弥漫着一股浓重的书生气。他刚出名后第一次出差，还不懂得如何办报销手续，特地到我们办公室问，走时告别不是和别人握手，而是两手抱拳连连作揖。他走后大家都笑着议论，真是书生一个。像这样一个一生只在小学教师岗位上的小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具备政治家的素质、眼光、见识和城府？但“文革”那种畸形的时代，却借着毛主席回信的东风，一下子把他推到了高端政治的风口浪尖上，赋予了他极大的政治发言权，他再也不可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之舵，只能随着变幻莫测的险风浊浪起伏升沉。据我所知，1973年他抨击政治的矛头还只是局限于当地机关一些反对过他和事，而对各级当局领导安排他那么多官衔还怀着感激之情，但从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开始，莆田地区乃至福建省的派性斗争就打着拥护“反潮流”的旗号缠住了他，把矛头对准了当局领导，首先就把李的入党时间拖延不能参加“十大”当做当局领导的大阴谋进行追查，进而把当地机关中反对他的一些人和事都当成是当局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策划，并上纲上线到这是反对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李庆霖本人在这种氛围中自觉不自觉地被推到第一线，和当局领导严重对立起来从而一发不可收。

1975年他参加了四届人大并当选全国人大常委后气势更红火了，派性势力对他的吹捧、利用也进一步无以复加，而他本人头脑也更加发热膨胀起来，更深地卷入派性斗争，把自己凌驾到当局领导之上，以“太上皇”自居的味道越来越浓。有人写信向中央反映了李的所作所为，姚文元就派记者来福建调查。调查的结论却是：“李庆霖同志保持反潮流战士的革命精神，对于错误倾向和不正之风，别人不敢说他敢顶”，“他同当地领导的矛盾实质上反映了在路线、方针、政策上的原则分歧”。这种结论当然使李庆霖更加有恃无恐。福建省委领导出于爱护向当时主持国务院工作的邓小平反映他的问题。邓小平批评说：“这个人入党不久，尾巴翘得那样高，要好好教育他，警告他，公开对他讲，你这样搞是要垮台的。”省委领导也找他谈话做工作，但在当时的形势下是很难起作用的。

到了1976年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李庆霖更是从莆田当地发展到成为福建全省的一个“派头”了，到处演说作报告，表态支持造反派，把各级当局领导当做邓小平之流批判、打倒。可悲的是，在他的心里，他完全把这当成拥护和捍卫毛主席和毛主席革命

路线的革命行动，他认为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中必须坚定不移地站在毛主席一边、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这样才对得起大恩人毛主席！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之后，他自然成了“四人帮”在福建的代理人、黑帮、亲信、爪牙而受到重重的惩处。10月底被宣布停职检查，随即被隔离审查了1年多，在莆田当地并被押到福州等各地，一天两场三场批斗，前后共有百多场批斗会，也时常有过拳打脚踢，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何曾有过这种境遇，他曾有多少次昏倒在地。1977年11月1日他被宣布正式逮捕。又过了1年多，莆田地区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被送到武夷山脚下的崇安劳改场关押改造。对此判决，李庆霖始终心存不服。他承认自己在运动中说错话办错事，但说他是打砸抢分子及带头人他绝不承认。当时福建拍了一部轰动全国的著名纪录片《铁证如山》，据说福建省委书记廖志高招待华国锋等中央政治局领导看了都感到震动。其中有个镜头：莆田县委大院里有间挂满枪支的房子里，李庆霖被带到这里，镁光灯闪过就被带出来，而解说词说：“李庆霖组织武斗队，大搞打砸抢，专业武斗队有201个，参加人数有6700人。”李庆霖只要有场合说话，就说那是强安在他头上的。后来即1990年南平地区中级法院给予减刑到10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1994年3月他出狱后虽获得了自由，但等待他的却是贫病交加的生活窘状，不仅没有经济收入，而且帕金森、脑萎缩、肺气肿、气管炎等多种疾病缠绕。

一人落难、全家遭殃，其妻张秀珍也被戴上“反革命”帽子并开除公职，“监督改造”3年，后来虽然给予平反，但一直到她1997年去世也没恢复公职。李庆霖给毛主席信中反映遭受困难的长子李良模，李庆霖有权有势时并没有趁机安排他回城工作，而是继续让他留在原地荻芦公社水办大队，后来在那里入党，并在荻芦公社担任一个挂名的党委委员，李庆霖被关押后他也很快被免去职务，到1980年全公社知青都回城安排了工作，唯有他一个人仍留下来劳动，1982年好不容易招工到仙游糖厂当厂区铁路的养路工，以后当上小火车司机，现在在一个镇的土地所工作。次子李良雄是在毛主席复信后，李庆霖带头又把他送去上山下乡，后来作为身边没有子女政策安排回城到县公安局工作，这时也被开除出县公安局。重新回到插队的知青点，但是知青办不要，街道也不收，他只好把户口揣在口袋里去打短工，直到1996年才安排到他母亲原来工作的莆田四中当一名职工。

在李庆霖遭难直至2004年去世的近30年中，唯一让李庆霖精神感到欣慰的是，全国两千万知青及家长大多没有忘记他，在李庆霖坐牢和出狱后，不少老知青想方设法找到他或打电话给他，有话语安慰的，也有寄钱送物的，这是他独有的一笔精神财富。

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是2003年8月12日。我大学一个同学的女儿在美国留学念博士，她博士论文竟是写李庆霖，而且该大学居然对这个题材非常感兴趣，专门批准她回来当面采访李庆霖。她所在大学里有两个美国教授，妻子都是当年中国的知青，听说她要回国见李庆霖，都委托她向李问好，我听了也很受感动。因此很乐意那天陪她来见李庆霖。

李还是居住在那低矮的旧屋子里，房间里的一切老旧得几乎原封不动，唯有墙上挂着毛主席像的镜框锃亮崭新。李庆霖只能躺在床上，气管炎很严重了，讲话上气不接下气，但仍然非常友善接待我们，有问必答，说话慢慢的却很真诚。问他当前生活如何着落，他说：出狱后分文没收入，逼得实在没办法，他找到莆田县领导批给他每月210元；后来接任的书记刘可清批准增加到每月300元；现在又增加到每月500元，据说是习近平（当时任福建省长）批的。他说出这些领导的名字一个一个记得很清楚，听得出他还是怀着感恩心情的。他最后几句话我记得很牢，他说：我不后悔给毛主席写信，毛主席没错，我也没错。后来发生的事是一场历史的梦，现在梦醒了，我也快归天了。

半年之后李庆霖去世了。我责怪他儿子没有通知我，没能赶过去送丧，但电话中他告诉我，当时出不起钱火化他爸爸，还是城厢区区长阮军批准给予免费火化。还有他没钱买墓地，1993年他奶奶去世、1997年他妈妈去世，连同他爸爸去世3个人的骨灰盒一直放在自家狭窄的屋子里而得不到安宁，后来也是阮军区长批准他以三折优惠购买了一小块公墓地，把3个人连同他早年去世的爷爷的骨灰一起合葬，终于使他们入土为安了。

我想，李庆霖的名字还是会被历史记住的，也应该记住的，连美国人都感兴趣，中国人更应该给予记载总结并吸取教训，本着这个目的，我把自己所知道的如实写下来。也许对历史研究有一点点价值吧。

□ 来源：上海知青网 WeChat ID shzqweb

~~~~~  
【文献资料】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的信（摘要）

• 徐景贤 •

春桥、文元同志：

听冯国柱同志和金祖敏同志说，四届人大期间，洪文同志在钓鱼台请了两次客。第一次请客，吃的是中国菜，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陈阿大、叶昌明、黄金海、马振龙、小仇（现兼做秀珍，敬标的秘书）等人。做菜的是从上海“莫有财”菜馆调去的厨师。席间喝了很多酒。吃完饭又留全体看美国电影《巴顿将军》，一直搞到清晨。

第二次请客，吃的是法国菜，是特意把锦江饭店的花师傅（四届人大代表）接到钓鱼台去专门做的，那天吃的有法国名菜“烙蛤蜊”等。至于烙蛤蜊用的盆子（盆内有一个个半圆的孔，把蛤蜊放在上边）和新鲜的蛤蜊等，都是由小仇张罗，专门从上海运去的。那天的宴会，完全仿照接待西哈努克的规格（冯国柱的描述）：桌上放了很多刀叉和各式各样的酒杯，每个人面前斟满了白兰地、葡萄酒、茅台、香槟等名酒，每吃一道菜就喝一杯酒。吃完法国菜又放映了西德影片（片名不知）。那天被邀去的有天水、秀珍、金祖敏、冯国柱、李彬山、小仇等人；陈阿大、黄金海、马振龙等没有被邀，可是这几个人早已知道小廖把人大代表花师傅接去，又要请客了，那天眼巴巴地等到半夜，结果宣布名单时没有他们，“阿大气得把京西宾馆的房门‘砰’地踢了一脚，马振龙他们还算识相，乖乖地去困觉了。”（金祖敏的原话）

第二次请客时，人大会议已结束，会务组通知上海代表集体乘专列火车回沪，少数有急事或年老多病的代表可买客机票。本来，天水、秀珍同志可以随团回来，或是提前乘民航机回沪（当时大会消息已发表）。可是，洪文同志却叫小廖打电话给上海民航局，把上海民航的一架新的三叉戟专机调北京给天水、秀珍等同志乘坐。上海民航局廖清纯局长以为是给上海代表团集体使用的，在三叉戟专机准备好以后，即打电话给京西宾馆找陈阿大（上海民航平时归工交组领导），问在专机上要预备些什么吃的东西。陈阿大接到电话，一听派了专机，而自己却坐火车回沪，马上火了，在电话里说：“没有我的份！什么也不要准备！”气得把电话挂上了。阿大又去找金祖敏挖苦说：“你们要的专机我已经替你们准备好了！”他还对其他几个人大代表发牢骚，鼓动了好些人都争着要坐专机。天水、秀珍同志一看情况不妙，就扯谎说领导同志还有事，晚上要找天水、秀珍、祖敏、冯国柱、李彬山谈话，让这几

个人留下，叫代表团其他人乘火车先走。其实，代表团刚走了一小时，他们几个就登上三叉戟专机飞回上海了。（他们还叫了金英同志一起乘飞机，金英同志怎么会知道此中真相呢？）

第二天中午，人大代表团的火车抵达上海北站，天水、秀珍和我到车站去接，秀珍同志怕露了底拚命要我也扯谎，向代表们说秀珍他们刚到，其实他们早已在上海过了一夜了。洪文同志调一架专机，简直象调一辆汽车那样容易。

人大期间发生的这些事，天水、秀珍同志并未告诉我；而是金祖敏同志这次调北京前，因对陈阿大有意见，才对我说了一些；冯国柱所谈的情况，则是我个别向他问起花师傅的表现时，无意说出来的。

其实，人大期间发生的事，无独有偶。就在十届二中全会短短的三天会议期间，洪文同志就请了两次客，这是我亲自经历的。一月八日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小廖电告秀珍，要我们大家“待命”。上海的中委、候补中委们一直等到半夜十二点多，没有动静，就陆续睡了。凌晨一点半，忽然来了“紧急集合”的通知。我们从睡梦中爬起，到京西楼下一看，小廖开了三部汽车来接我们了。于是，天水、纯麟、秀珍、祖敏、周丽琴、杨富珍、汪湘君、张国权、冯品德和我共十人，登车直驱钓鱼台。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设了一桌酒席招待我们，还请大家喝湖南长沙著名的“白沙酒”。席间，大家还争着抢朝鲜送来的大梨，大苹果。筵席上除洪文同志外，只有小廖作陪；我问肖木到哪里去了，答曰早就睡了。散席后，大家还一起看美国影片《出水芙蓉》。

一月十日，全会结束的那天晚上十一时半，洪文同志在京西七楼的套间中，又一次设宴请客，在座的有洪文、天水、纯麟、秀珍、金祖敏、我和小廖等人。我在京西从来没有见过这么丰盛的酒席，冷盘热炒，十分精致，再加上陈年茅台（女服务员小张夸口说这酒放了多年，每瓶要比新酿的茅台少好几杯）。席间，秀珍和祖敏为了长沙“白沙酒”的酒瓶好看，争着索要。小廖说：“快吃完了，只剩一瓶了。”

洪文同志的这种追求享受，讲究排场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在十大以前即有滋长，在十大以后又进一步发展了。仅去年一年，黄涛去京开会三次，洪文同志就至少请了三次客，而且每次都有内部影片招待：第一次饭后看英国片《女间谍》，第二次请黄涛和敬标（当时刚从日本回来）一起吃饭，饭后看美国彩色片《十诫》，第三次饭后看《跳不完的舞》。在钓鱼台住所请他们吃饭还嫌不够，洪文同志又专门到新建的北京饭店设了一席，招待黄涛和敬标。他们吃了回来，还啧啧赞美，说是北京最高水平的菜。但是，这要挥霍掉国家多少钱呀！（张敬标对我说：洪文同志请客有特别费用可以报销。）此外，听说洪文同志还在钓鱼台分别接见、宴请了马振龙、廖清纯、祝家耀等人。直到最近，张振亚从北京开全国体工会议回来，还说洪文同志请他吃饭，喝酒，并一起看了彩色影片《日本的沉没》，内容“描写大地震，有很多恐怖，黄色镜头。”（张振亚语）当然，我所知道的这类请客吃饭的事，仅仅是一部分。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领导同志提倡这类作风，下边就跟着学。就拿小廖来说，去年，前年来上海办事四次，几乎每次都有人大请其客。秀珍、敬标、黄涛和警卫处的康宁一政委等都单独请他吃饭，原工总司的人也纷纷请他吃饭，吃遍了各大饭店。有一次连马老也自告奋勇，特意在锦江请了两桌。我虽然没有请他，但他们要我作陪的也有三次。至于其他多次（包括小廖回请在内），因为他们回避着我，都没有告诉我，我是从警卫员等处听说的。



有一次吃饭时，天水同志当着洪文同志和我们的面说：“洪文同志到中央工作后，进步真大呀！”洪文同志则马上回话：“不是我吹捧，老干部象马老这样的精神面貌，在全国都是少见的！”这一类话，出自两个党的高级干部之口，难道是正常的吗？再说，象小廖这样的秘书到上海时，不但有人争着请客吃饭，而且以秀珍同志为首，带领黄涛和原工总司的同志，大队人马到机场迎送，不止一次，这种曲意奉承，阿谀拍马之风，不正是宗派主义，山头主义的孪生弟兄吗？

有的人除了大肆挥霍，请客吃饭之外，还搞封官许愿，送礼送钱之类的活动。十大期间，洪文同志当面对黄涛说（马老、秀珍、祖敏和我在场）：“这次中委因为老干部多，就不提你了，今后可以当市委书记。”黄涛同志在工作上是有水平和能力的，但他在对洪文、秀珍和小廖等的关系上，表现了一种资产阶级的庸俗作风。这次万人体育馆的改建，黄涛明明是有意见的，他在背后也曾向我流露过，但他在会上讨论时却积极表示要改建，甚至还提议在体育馆主席台后面装电梯，以方便首长。等到春桥同志对洪文同志做了工作以后，洪文同志连夜两次打电话来通知不要再敲，再改了；第二天春桥同志在和马老通电话时又指示不要为了好看而改建主席台。这些马老都告诉了黄涛，而在这以后黄涛却又和小廖通电话，建议还是要按洪文同志原来意见，敲掉主席台下的七根柱子进行大改。小廖请示后没有答复。以上情况都是马老亲口告我的，他对黄涛此举也隐隐表示不满。黄涛这样做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私底下表示“效忠”呢？

洪文同志过去在上海时，对坐什么汽车，穿什么料子的衣服，着什么样式的皮鞋是很讲究的；到北京以后，通过某种合法、非法的途径要的商品更多。就我所知道的，他那里有可以拍连续动作的外国照相机，有晚上充电后白天可持续使用的日本袖珍收音机，有能够奏音乐的打火机，有可以作远距离操纵的彩色电视机，有工交组送去的国产盒装录音机，有轻工业局马振龙等送去的手表、照相机、酒芯糖、彩色胶卷等，有到上海定做料子服和皮鞋，有从上海公安局取去的猎枪，等等。直到二月十日，金祖敏赴京工作临上飞机以前，黄涛还偷偷地托他带了一枝特制的猎枪给洪文同志，这支枪是拆开后伪装在一个手提盒子内的。（林彪一伙用盒子装过冲锋枪，我们的同志为什么学他们的样呢？）

他们除了拿用的，还有吃的，还有货币。我们的张敬标同志除了给洪文同志多次送螃蟹，送蚬子，送水果等食品以外，还经常给洪文同志送钱去（去年春、秋，小仇就秘密去京两次）。据敬标自己说，洪文同志处是每个季度送些钱，秀珍，祖敏等是逢年过节“补助”一些，并说是经马老同意的。我曾问他每次给的具体数字多少，他吞吞吐吐地说有几百元，始终未说明具体数目，并说是洪文同志那里打电话来要的。连敬标自己也说：“恐怕太多了！”

洪文同志的看影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娱乐和消遣。在上海时我发现他对香港片特别有兴趣，对《锦上添花》《满意不满意》等低级庸俗的喜剧片津津乐道，对某些有严重错误的影片不能鉴别，反而认为是好影片。在他说来，当然有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不能苛求。到了北京以后，他看的影片既多且滥，听秀珍同志说：有个时期洪文同志几乎天天晚上看电影。听小廖夸耀说：“钓鱼台的影片，中国电影资料馆的影片，外交部，中联部和文化组的过路片，我们都能调。”听于会泳个别对我说：“洪文同志那里过路片最积极，有些影片太黄色了，我们都不敢报给首长，小廖也调去看了。”十届二中全会期间，洪文同志亲自对天水、秀珍和我说：“我什么电影都看，无非是黄色的，反动的。”这话说得多轻松。有些电影他还要一看再看，例如《战争和人》第一、二、三部，他就看过很多遍，这种影片里那么多下流镜头，多看有什么好处呢？何况小廖这样的青年。又如《出水芙蓉》，这是我想看的一部影片，因为会泳同志告诉过我拍摄乐队时用光有特点，可是这次在洪文同志那里观看时，还看到许多泳装女郎的游泳镜头，小廖在一旁说：“这部影片我们看过好几遍了，第二

本已经放坏，不能再放，今天把他跳过去。”我不禁在想：他们看过好几遍的这些影片，究竟是看些什么？

去年十一月，我生病住院时，小廖到上海来为首长搞宽银幕，他随身带来两部宽银幕影片，在上海小范围内试片，一部是美国的《女人比男人更凶残》，一部是罗马尼亚的《达吉亚人的后代》，他说也已看了多次，看来这些影片已经使某些同志上瘾了。

洪文同志变得更加自满，更加不注意努力学习和自我改造。我们和他接触，听他谈话的内容，几乎极少提到学习马列和主席著作的，但是打猎呀，钓鱼呀，打扑克呀，打羽毛球呀，打靶呀，看电影呀，等等，却占据了他生活和话题的很大一部分内容。他到北京工作后来过上海几次，在每次短促的行程中都要用好几个晚上的时间打扑克，打羽毛球。在他的住所打扑克时，加上金祖敏等，往往打上几个通宵。

十大以后，特别是十届二中全会以后，我对洪文同志的担心增加了。十届二中全会开幕的那天晚上，洪文同志请中委，候补中委看电影，在放映正片之前，加放了过去国民党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几部反动的新闻短片《中国新闻》（分若干辑），其中最主要的是拍摄反动头子蒋介石如何主持召开国民党军委会，如何瞻仰中山陵，如何巡视灵谷寺等。蒋介石穿着笔挺的军装，戴着白手套，对周围致敬的人频频答军礼，前呼后拥，拍得非常威武，非常有气派。小廖在一旁向我们介绍说：“象这样一类影片，我们还看了好多，比如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到上海，跑马厅开欢迎大会，蒋光头登台发表演说等等，什么都有！”

景贤上

一九七五年三月十日

□ 来源：《批判“四人帮”及其党羽参考资料第3卷》，1976年

~~~~~

【亲历者言】

我逼迫林杰制造《声明》

• 赵建文 •

这件事既是我在“文革”直接向一位“大人物”发难的一次派性活动，同时又是诱发我后来告别派性、告别文革的事件之一。

大约是在1966年8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十一全会以后，《人民日报》在刊登陪同毛泽东接见活动的人物照片时，经常左边是林彪，右边是周总理；在报道参加者的名单时十分突出“中央文革”的主要成员，而一些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员反而或排在后面或根本不让出名字。这种不符合中共中央组织系统的排列顺序，往往被“红卫兵”当作分析“红司令”态度的标尺，他们由此去确定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谁是毛泽东要“保”的人物。除此之外，当时北京还有一位“红卫兵”不敢随意触犯的“大人物”，他就是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实际负责人林杰。此人名字虽然在报上不经常露面，但多数“红卫兵”、“造反派”私下都认为他同“中央文革”成员王力、关锋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所以他在“红卫兵”眼里是位惹不起的人物。从1966年底到1967年8月“文革”时期的“动态报”都刊登他的讲话并领悟其精神，各派“红卫兵”都尽量与他取得联系并希望得到

他的认可和支持。“红卫兵”这个群体的特点之一就是积极寻找被“红司令”认可的人物作为自己的“后台”。

1967年中期，北京大学逐渐形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一派是反对聂元梓的“井冈山兵团”，一派是“保”聂元梓的“新北大公社”，我是属于后一派的一个“战斗队”的队长。7月份的一天，对立面组织在北大最敏感的地方即“三角地”贴出一张题为《林杰谈话》的大字报，大约有500字，主要内容是：我是认识聂元梓的，她这个人后来骄傲了，不能容纳不同意见。她不应该镇压校内其他造反组织，因为大家都是“毛主席的红卫兵”，我希望你们这些人要多多帮助她。这张大字报一出来立即引起校内外许多人争相观看，并且成了校园内大家议论的话题，形成了对我们不利的舆论导向。当时北大正处于两派扩大队伍的时期，《林杰谈话》无疑是对我们这一派“士气”的重大打击。

1967年初，我为了探听林杰对北大我们这一派的态度，曾经利用我的一个同学是他的同乡和学生的关系去找他了解情况，并与他面对面地交谈过一个多小时。由于我很清楚林杰对北大“保”聂元梓这一派的人持什么态度，所以认为这张大字报的内容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派性的立场使我不甘心于听任《林杰谈话》影响的逐渐扩大，极想用一种方法来消除林杰的影响。当时，我是这样分析的：林杰公开身份只是《红旗》杂志的实际负责人，该杂志虽然经常刊登一些有“来头”的文章，目的在于煽动“红卫兵”起来“闹革命”，但这个杂志的特殊性决定了林杰本人决不会被中央授权公开支持哪一派和反对哪一派，这样他就不敢公开把事情闹大，因为闹大了对他不一定有什么好处。由此，我们“战斗队”决定直接找林杰交涉，想以公开闹事的办法逼迫林杰自己发表一个否定自己有此“谈话”的声明，从而遏制他的影响，达到维护本派“声望”的目的。

于是，在看到那张大字报的第二天上午，我就带了几个学生“红卫兵”直奔《红旗》杂志。因为我曾与林杰见过面，担心被他认出来找麻烦，所以就躲在大门外面的马路边上等结果，让其他人直接到楼里找林杰交涉。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们返回找我，说在大楼进口处被人挡住了，经传达室的人联系，来了一位自称是林杰秘书的人接见了他们。该人是有准备的，讲了三条意见：第一，林杰到中央开会去了，不在家；第二，林杰从不管北大的事情，所以他也不可能有一个关于聂元梓的谈话；第三，《红旗》杂志是党中央的机关，你们不能到此冲击机关，应该立即返回北大。之后，他们就被轰了出来。

我们几个人商量了一下，立即作出两个判断：一个是林杰一定就在楼里面坐镇指挥，否则见我们的人作为秘书根本无权讲第二条；一个是林杰秘书虽然讲了一些威胁我们的话，但他们似乎更害怕我们会在楼里继续呆下去，想让我们快点走，否则不会这样对待我们。因此，我让他们再到《红旗》杂志的楼里，搞一个“静坐”，并且对《红旗》杂志社的人说，如果林杰不接见我们，他应该交给我们一份否认有“林杰谈话”的声明，否则会有更多的人到这里静坐。他们等了大约一个多小时之后，那位秘书见几次劝说无效，最后终于送来了一个《林杰声明》。它的内容大致是：

我林杰是《红旗》杂志的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不了解北大两派的情况，只知道聂元梓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我是支持聂元梓造反的，北大校园内贴出来的《林杰谈话》决不是我所要讲的内容，我也不可能说出那些话来，中央也没有让我去管北大两派的事情。

我们当时没有想到这个“声明”如同我们自己写的一样，于是得意洋洋地立即骑车返校，把《林杰声明》贴在《林杰谈话》旁边，并且由“新北大公社”的《动态报》全文刊载这两篇相反的东西，意思是说对立面一派造谣。

无论当时我有多么得意，无论林杰当时有多么懊丧，以及后来他有何遭遇，就这件事情本身的性质来说，这纯粹是一种派性活动，它本身没有什么可以称道的。但是，从中能看出那时“红卫兵”思想的轨迹，那就是为了自己一派的利益是不择手段的。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即“对派性要作阶级分析”（见1967年4月20日《人民日报》）。当年的“红卫兵”根据这个“最高指示”，把自己看作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派”，把派性活动说成是为了捍卫“无产阶级司令部”。这种做法虽然现在看来十分滑稽可笑，但对当时的大多数“红卫兵”来说，它不仅是为了对外宣传，而且也是一种信念。我自己就有过这样的经历，直到1970年以后才逐渐开始发生怀疑与动摇。

事情的原委仍然要从对《林杰声明》的反思谈起。

以1968年“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大中专学校为标志，“红卫兵运动”不再“风光”，而且进入被“修理”的阶段。北大开始是一派的头头挨整，自中南海的8341部队的“军宣队”进驻学校之后，在迟群、谢静宜领导下对两派不归顺的头头和骨干分子都进行了“修理”。由他们领导的“专案组”在关押我的4年多期间内有一点忽略了，那就是不应该让我同对立面即“井冈山兵团红卫兵”的头头们接触，因为我们聚在一起，相同的遭遇必然会交流出相同的思想，这是毫无疑义的。我们在一起议论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大家互相补充，互相修正，这不仅显示了我们所作所为的前因后果，而且使我们在思想上有一种受蒙蔽、被欺骗的感觉。

1972年冬天，我和对立面派的一位叫徐运朴的人在接触中成了至交。我向他讲了《林杰声明》“出笼”的过程，他向我讲了《林杰谈话》的真实性及其来龙去脉。我们共同确定这两张内容相反的大字报都是同一个林杰所制造的，其目的在于引发北大两大派互相坚持自己的观点，相互残杀。由此，我们又议论到北大两派之间、北京市的“天派”、“地派”之间，他们互相对立究竟是如何造成的？有一点我们两个人都十分清楚，那就是“中央文革”的主要人物对北大的两派，今天讲这一派中有“坏人”，明天又讲那一派中“有人不好”；昨天表示过支持这一派的“造反”行为，后天又表示要“保”那一派的头头，结果只能使两派“红卫兵”对立到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当然，那时我们两人的一些言论，都没有达到对整个“中央文革”不满的程度。老实说，当时徐运朴身背着一个莫须有的“反江青”的罪名，我们也不敢对江青说三道四，那时那刻的我们还处于尚未彻底觉醒的阶段。可是，由林杰话题引起的议论是我们两人后来告别“文革”的起步阶段。根据我的了解，有相当多的“红卫兵”、“造反派”就是从这种议论中才逐步认清“四人帮”真面目的。

说到徐运朴这位“红卫兵”头头，他去世以前一直同我过从甚密。据我所知，他有三件事值得一提：一是他曾经被我们这一派关押过4个月并受到了非人的折磨，曾经被8341部队驻北大“军宣队”关押过二年之久并受到非人的待遇；二是他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曾经到医院看望过邓小平之子邓朴方（他原是北大的学生），这在当时是需要一定勇气的；三是他在“四人帮”倒台后，不仅原结论予以彻底推翻，而且在社科院苏东所过了十几年舒心的日子，还被评为副研究员。

（注：本文2000年发表于《百年潮》第10期。该文作者赵建文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于2016年6月14日因病去世。在赵建文逝世前一个月又12天（即去世前43天），我与北大校友索世晖一起去看望友人赵建文。2016年5月2日上午那天，一进赵的家门，他就送给我们俩人每人三篇他的文章影印件，三篇都是有关文革史的事情。他知道我们来了一定会聊文革，其中一篇就是本文《我逼迫林杰制造〈声明〉》。当时

赵建文患的病是白血病即血癌，他应自知时日不多。因此笔者在他去世后，把他交给笔者的文稿看作是一种托付。此次编辑《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特选登了赵建文的此篇文章。笔者感到此文很重要，赵通过亲身经历，分析了当年北大两派及北京“天派”、“地派”分裂和打派仗的原因，而且他的反思是他和“北大井冈山兵团”重要头头徐运朴的共同看法，因此尤其应引起重视。——王复兴)

(作者简介：赵建文，出生于1940年12月14日。1960年入读北京大学哲学系；1965年毕业于哲学系，读研究生并留校任教。2016年1月退休，2016年6月14日因病去世。)

□ 来源：《回顾暴风雨年代——北大文革亲历者文集》，王复兴主编，美国南方出版社，2018年

~~~~~  
【一家之言】

我在文革漩涡中（选载之四）

• 聂元梓 •

第六章 夺权与分裂

◇ 一月夺权

“一月夺权”是文革中的重大事件，它起源于上海，经毛主席、党中央的推而广之，很快遍及全国。上海“一月夺权”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1月8日，他在谈及《文汇报》、《解放日报》的夺权时指出：“这是一个大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这件事对于整个华东，对于全国各省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必将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上海一月风暴吹到北京后，中央号召北京群众组织参加夺权。周总理在1967年1月18日接见群众组织的讲话中说：

今天30多个单位夺了北京新市委的权，我们祝贺他们的胜利。今后的任务首先吸收一些主要的工厂、吸收更多的职工帮助加强力量。综合性大学要负起主要责任，如北大、清华、师大……要负起主要责任，而不是派几个人参加几次会议的问题。首先是监督他们的工作，不行的就撤他们的职。参加的就要加强，没有参加的就要参加。既然前进就不允许半途而废。党中央、文革、解放军都帮助你们。要完成这项史无前例的任务。我们信任你们，你们同时也应信任我们。这样大的事情，随时都要和我们取得联系，24小时内我们都要听电话的。

北大积极响应周总理的号召，校文革于19日成立了夺权指挥部，具体负责人是校文革副主任徐运朴。

北大大约参与过13个单位的夺权活动。但有些单位不是校夺权委员会派的，而是群众组织自发的。在一月份，北大参加清理外来人员的工作，如全国总工会、团校、劳动部、交通部，物资部，在那里的北大学生就直接参与相关单位的夺权活动了。北京市政府的夺权，以北航为主，我们没有参加。北京日报、光明日报的夺权，我们和北航在一起，和师大意见

相左。去华北局和中央组织部的同学只是表了一个态，什么事都没有做。在统战部和吴传启的势力发生了碰撞。在中宣部我们支持阮铭，但阮铭在夺权的问题上受到中央文革的批评。在高教部和教育部的夺权中，北大和师大发生了激烈冲突。

一九六七年一月夺权的时候，在北大搞军训的63军部队和学生一块出去夺。中央号召革命造反派向走资派夺权，号召军队要支持地方上的左派夺权。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夺，学生们到处跑着夺权，瞎跑了几夭，有跑到中央组织部的，有跑到华北局的，我也跟着上华北局去了。跑去以后，觉得不对劲，这是去干什么？学生还能取代华北局？可是不行动也不行，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夺权号召啊。

我先冷静下来，想一想，我理解党中央的精神是说大联合然后才能大夺权。毛主席号召，让革命造反派联合起来夺权，这是最高指示。中央文件和报纸上也是提倡，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走资本主义路线的当权派夺权。我必须响应和紧跟啊。

当时，人们以为夺权就是夺大印夺公章，把一个机关的印章拿到手里，这就是夺权了。但拿到手以后怎么办？事先没有想，只是觉得被夺权的单位领导人就是走资派，反正不能叫坏人掌权。可是好人是谁？叫谁来掌权？事先一点儿想法也没有，更没有一个计划。就是领着学生瞎跑，还要跑得越快越好，哪个学校的学生先跑到那个单位了，先入为主，就算人家是头儿了。但是，就算这个学生是头儿，也不一定就能掌权。几个年轻学生，他们掌握得了这么重要的权力吗？

我们联络了一批工厂、机关、学校的群众组织，就决定在广播事业局大楼里设一个点，一个联络站。广播事业局大楼在复兴门外大街上，地点适中，便于全市四面八方的人们来往联络，当下就成立了一个大联合的组织，叫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方方面面都有。我说，毛主席号召我们是联合起来夺权，我们先联合起来吧，至于怎么夺权，我们都要听毛主席党中央的指示。中央一声号令，我们马上去夺权（这是我当时的一个明确的想法，夺权要听中央的。我们到高教部去夺权就是听了周总理的话去的）。我说，大家先登记一下，各组织要参加大联合的都把单位、电话、联系人登记下来，都回去等着，只要中央有了指示，我们就立刻通知你们，立刻就叫你们来，就去夺权，各个造反派组织都是敲锣打鼓地来，来了就算参加大联合了，登记完毕，又喜气洋洋地回去了。从门面上看，我们有多少多少组织，有多少多少人，搞得声势很大，实际上都是空的，没有什么具体行动，所以也就没犯什么大错误。

虽说“文革”发动起来不过半年时间，但我对于当下的夺权运动已经有了自己的看法，已经从最初的坚信不移步步紧跟，向着独立思考、冷静分析转变了。我毕竟比那些单纯的大中学生、来自社会基层的工人农民们多一些工作经历，对于党政机关和各部门的情况了解一些，对于政策性的问题也思索得多一些。我想，党中央规定的“十六条”里明明白白地讲，党的各级干部分为四种情况，好的、比较好的、犯了严重错误的以及少量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后来又把这最后一类称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并且明确指出，“在一般情况下，前两种人（好的，比较好的）是大多数”。现在号召夺权，也是号召向不肯改悔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但是，“走资派”是相当模糊的概念，它的划分依据是什么？具体而言，应该向哪些人夺权？当然应该是向走资派夺权，总不能把所有的老干部都打倒，把所有的权力都夺过来吧？老干部不等于走资派，何况，即使是走资派，也还有可以改悔的，不能够一概都打倒。自己也是个“年轻的老干部”，对于干部队伍，自认为是比较了解的，这样，在如何夺权的问题上，我就有自己的考虑，这也影响到北大的学生，对夺权运动参加得比较少。

但是，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的夺权风暴中，我的这些想法是不可能公开地讲出来的，不执行毛主席联合起来夺权的号召，也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就把毛主席号召群众联合起来夺权的指示，特意在执行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步是要做好群众组织的大联合，把联合夺权的口号喊得很响亮，行动却停止在联合上。表面上搞得轰轰烈烈，但是怎么样夺权，向谁夺权，夺权后又交给谁掌权，我都坚持一定要听党中央毛主席的，等待中央有了明确指示再去夺权。

这时候，北京的几个大学造反派头头非常活跃。蒯大富、韩爱晶都到市里去夺权，谭厚兰和王大宾也都有各自的一个摊子。韩爱晶跑到市委夺了权，成立了“北京市夺权委员会”，派人到广播事业局叫我去市委，都是造反派，我也不好拒绝，就到市委去了。韩爱晶说，我们要夺权，你参加我们的夺权委员会吧。我说行啊，我回学校去，跟我们的学生说一说，你等我的回话吧。结果，我回去以后，却没有给他们下文了。

在那种形势下，夺权的行动，口头上我不能说不参加，但是我心里明白，我绝对不参加。我到了市委，看到那里的情况，更觉得不能参加。参加夺权的组织和人很多，乱七八糟的，把市委的办公室搞得一塌糊涂。这些人也能掌权呀？还有，夺权的人们把北京新市委的负责人吴德、丁国钰、刘建勋等人都关起来了。我想，你们把他们关起来做什么？你们不是背上包袱了吗？关起来容易，你们怎么放呀？（被工作组关起来的陆平等，我们北大校文革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还觉得是个沉重的包袱呢！）你们要是把旧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关起来，还说得过去，毛主席给他们定了案了。吴德、丁国钰、刘建勋都是彭真和旧北京市委倒台后新调来的，刚刚在北京工作了几个月，犯错误也来不及犯大错误。他们能有什么大问题？既不是走资派，也不是叛徒、反革命，要是说，他们原先所在的单位，出面揪斗他们，如河南之于刘建勋，吉林之于吴德，那还说得过去，北京的造反派能抓住他们什么问题？难道说，所有的老干部，统统都烂掉了，一个都不能要了？我在现场看了一下，见了那种乱哄哄的局面，更使我坚定决心了。我不能跟你们一起夺权。你们掌不了权啊。夺了权谁来掌权？就交给那些学生呀？难道学生就能掌权？难道我就能掌权？北大的事情已经把我搞得焦头烂额，我管得了那么多呀？

#### ◇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

陈伯达接见北大、北航等校造反派时说：“建议你们工农兵学商开个临时联席会，筹备一个比较大的范围的工农兵学商的代表会议。”1967年1月26日，陈伯达、江青等接见北京高校造反派时，陈伯达又提出：“跟同志们商量一下，搞一个工农代表大会……你们看条件成熟不成熟？”江青的讲话则强调了三个红卫兵司令部的联合，“不要让别人以为三个司令部不起作用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的成立，正是对陈伯达、江青有关讲话的响应。

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是北大和一些单位联合发起的，于1月27日发表了《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倡议书》，提出“迅速召开北京市工农兵学商革命造反派代表大会，从走资派及一小撮顽固推行反动路线的家伙手里全面地夺回北京市的领导权。”《倡议书》上列名的发起单位有30个，包括北大校文革、清华“井冈山”、地质“东方红”、师大“井冈山”等大学和若干工厂的群众组织。

2月6日，地质“东方红”、北师大“井冈山”等组织宣布退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有退出的，也有来合作的。2月7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同另外两个夺权组织联合，成立了新的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全市7个主要夺权组织中有3个联合起来了，应该说，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在联合方面是有成效的，并且很快同“北京市夺权委员会”（简称“夺委会”）达成了新的协议。

应该指出，这是北京市群众夺权运动走向按系统联合——建立工代会、红代会、农代会——建立北京市革命委员会的重要一步。

1967年3月1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宣告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即将结束活动。1967年3月3日北大《动态报》记载：

3月1日《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红代会工农兵联络站》发表联合声明：……无产阶级革命派要夺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权，必须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现“三结合”，否则夺权就是一句空话。……《北京革命造反公社》《红代会工农兵联络站》从它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明确指出它是革命派大联合的过渡组织。它适应北京革命派大联合的形势而产生，为实现全市的大联合作出自己的努力。根据当前形势的要求，我们自己在所属的单位积极进行按系统、按部门的联合，目前这项工作已基本告成，因此我们也就完成其历史使命，即将结束活动。

不难看出，北京革命造反公社只是响应党中央号召、为联合夺权成立的一个临时性的组织，没有夺权的实际行动，更没有掌握过任何实际权力；北京革命造反公社从成立到结束，都是努力紧跟中央、按中央的精神去做的，在搞大联合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高教部夺权起风波

根据周总理的“夺权要在本系统夺权”的指示，北大学生也到高教部去夺权了。在校外，北大只是实实在在地参加了这一次夺权。到高教部夺权时，在北大搞军训的63军部队带着学生去参加了，现场负责人是李士坤和赵建文两位青年教师。我没有和学生一起去。

当北大到高教部时，已有许多单位去了。参加夺权的单位有30多个，组成联合夺权委员会，负责单位是“清华井冈山”。北大去后，反对高教部的“延安公社”，因为“延安公社”的负责人是卢正义、徐非光。北大根据已经掌握的材料，认为他们是叛徒。师大谭厚兰等则认为卢、徐是响当当的左派，坚决支持“延安公社”。“清华井冈山”发表了一个中立宣言，表示不介入北大和师大的矛盾，宣布退出高教部夺权。

二月一日深夜，卢正义、谭厚兰等人纠集了数百人对北大驻高教部联络站发动突然袭击，砸了新北大的办公室，并对新北大同学进行人身攻击。

事件发生后，二月二日，林杰俨然以中央首长的姿态向师大和“延安公社”下达四点“指示”：

- （1）我们（师大和延安公社）的行动是革命的行动；
- （2）解放军参与这一行动是错误的；
- （3）新北大是错误的；
- （4）解放军马上撤回去。

同日下午，关锋、王力打电话严厉地批评了北大。二月四日，王力、关锋又一次给孙蓬一打电话，批评北大要搞“三路进军”等等，都是莫须有的罪名。

后来陈伯达也给我打电话，叫我把北大的学生叫回学校，并且要向谭厚兰道歉。道歉就道歉吧，我到了高教部，找不到谭厚兰，她躲着不见我。那就算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等下去。我和63军的同志一块儿把北大的学生叫回学校。这件事使我对王力、关锋等人有了



一些认识。怎么作为中央文革的领导人还说谎话呢？凭空捏造，诬陷学生和解放军，这算什么行为？

◇ 关锋、王力一九六七年二月二日的电话

关锋：孙蓬一同志，我通知你一件事，中宣部前些天搞了一个所谓夺权，阮铭勾结反动组织红色职工造反团一起搞的，他们夺了印刷厂（印刷厂本来已归《红旗》杂志夺了），把中宣部的印也收了去，钥匙也收了去。中宣部的权中央早就夺了，阮铭的问题很严重，勾结反革命。已经向阮铭交待，要他老老实实，向真理投降，将功赎罪。你们要注意和他划清界限。你们为什么说徐非光是叛徒？当时大家的水平都那么高吗？要说检查的话，聂元梓也有检查嘛！阮铭也有嘛！徐非光是叛徒，那他们算什么？师大的同志还是顾大局、识大体的，没有公布聂元梓的材料。你们现在有些做法，恐怕是要考虑的，自己解放自己，但是中央文革的意见还是要听的……下面王力同志有话和你说。

王力：昨天夜里，接到师大井冈山同志的情况反映，今天又听到一些反映，关于高教部的事情从好几个方面得到反映，在你们的支持下，砸了“延安公社”，抢了北师大的广播台，然后北师大又去抢回“延安公社”。你们又调了一两千人，还有军队，他们遭到你们围攻和打骂，据说北大同学还要师大承认是反革命事件，师大提出不能这样做，结果你们绑架走了七个人，围攻了三百多人。民族研究所支持你们的人中有的绑架过洪涛的人，这个问题我们感到很严重，北大这样搞，不知你们为什么采取这个方式，我们已经通知了部队让他们立即全部撤出，解放军不能参加打架，你和聂元梓要亲自去处理，有分歧可以通过辩论去解决，要研究一下，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问题，打人，绑架，围攻，谩骂，为什么这样做？要好好学习一下“红旗”社论。目前面临着淮海战役的形势，在这样大的战役摆在面前，我们为什么搞这样的事，你们要好好学习打倒“私”字的社论，以及“解放军报”加的按语，毛主席认为这篇文章提出了一些带有普遍意义的重大问题，要联系实际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你们主要负责同志要严格掌握原则，首先要严格要求自己。

（孙蓬一同志当时想反映一下真实情况，对王力说：“王力同志，我们所掌握的情况和你所了解的情况恰恰相反，是不是我把所掌握的情况向你汇报一下，你现在没有时间，以后再找时间向您汇报一下。”）

王力：我们不听了，你们两家打架的情况哪一方面的情况我都不愿意听了。

关锋：你和聂元梓应该站得高一些，做事情要有利于无产阶级大联合，要求自己站得高一些，你们有些做法，站得不高，对“延安公社”不要采取那样的态度。你们骂徐非光是叛徒，这是不对的。在当时的情况下，是可以谅解的，何止一个徐非光，如果徐是叛徒，阮铭是什么呢？这方面如果有错误，聂元梓也有嘛，当时的觉悟都不那样高嘛。现在要团结，至于每个人以后怎么样，还要用实践来检验。在这个问题上，北师大井冈山同志是顾大体的，他们没有公布聂元梓的材料，不要搞这一些，现在革命就好了嘛。告诉聂元梓要注意这一点，不能抓住小辫子就这样搞，要抓小辫子，聂元梓也有，不要搞这些行动。

（孙蓬一同志插话：“关锋同志，师大上报的情况，他们作了完全歪曲的反映，是他们首先打了我们的，我们是来解围的。”）

关锋：你们就不应该去！你们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 二月四日王力、关锋的电话

关锋：孙蓬一同志，听说你们明天（指二月五日）要组织人搞三路进军，一路冲钓鱼台抓关锋，一路到《红旗》杂志社抓林杰，一路冲北京卫戍区（激动地）有没有这回事？（孙蓬一回答：没有。）没有？！这消息来源是可靠的。你们来吧！我们等着你们！（关锋发很大的火）

王力：到底有没有？（孙蓬一答：的确没有这回事。）到底有没有，还是你不知道呢？（孙蓬一答：肯定没有。我们可以查一查。）

关锋：（厉声地）我查过了，我们的消息既非来自师大，也不是来自《延安公社》，而来自军事机构，很可靠！你们来冲吧！来了我们也不怕！

王力：你们这是严重错误，你们要走向反面，你们转了向了。怎么搞的，对师大的兴趣就这么大，到处夺权，这儿抢，那儿夺，有没有私心杂念？

关锋：从六月以来树立起来的人，到底是从无产阶级世界观出发，还是从资产阶级世界观出发？我们希望立起来的人多站住几个，不要做昙花一现的人物。（孙蓬一同志答：说我们三路进军，这完全是造谣、陷害，我希望汇报一下真实情况……）

关锋：我们不要听了！

#### ◇ “一·一五”抢劫档案事件

1967年1月15日凌晨1时15分，刘郅（统战部宗教处副处长、国务院宗教局第一副局长）和学部民族研究所洪涛等，调集了二百余人，把统战部和国家民委的档案室抢劫一空。当天，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和统战部的部分群众把洪涛、刘郅扭送到公安部。周总理指示：由三方面（中央并公安部为一方，抢档案的为一方，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为一方）协商追回档案。下午，公安部副部长严佑民，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副局长曹幼明亲临现场。严佑民说：“我们来是总理指示的，总理很关心，怕国家机密被弄走。”并指出：“这个事件是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抢档案事件”，“这是严重的政治事件”。但是第二天，刘郅、洪涛却被公安部释放了。公安部还印发了一个《公安部某负责人就一月十五日“红色联络站”接管中央统战部档案问题的讲话》，全文如下：

一、《彻底摧毁中央统战部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红色联络站》的革命左派同志，为了保护国家档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晨，接管了中央统战部一批档案，并封存，这完全是革命行动，大方向是正确的。

二、中央统战部革命造反团的一小撮人，盗用公安部的名义，非法绑架、斗争、拘留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洪涛、中央统战部《东方公社》刘郅、林祉成等革命同志。这是犯法行为、是直接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行为。

中央民族学院文革临时筹委会材料组，又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十时印发传单，佯称“中央民族学院革命造反派红卫兵总部于一月十五日把现行反革命分子洪涛等人扭送公安部，公安部已签字拘留”。特郑重声明：洪涛、刘郅等同志是革命左派，大方向是正确的。说“公安部已签字拘留”了他们，这是彻头彻尾的造谣。

三、公安部接待站的个别人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五日晚十一时五十三分，趁接待站来访人员较多，秩序混乱之际，不分是非逮捕了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韦清风同志，是完全错误的，是违法乱纪的。

事后，经我部调查了解，韦清风同志是革命左派，并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六日上午宣布释放，公开道歉予以平反。对上述所犯错误的有关人员，我们已责令其作公开检讨，并予处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印 一九六七年元月十七日

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对这个“讲话”十分不满，到公安部理论。洪涛等人又以冲击公安部和迫害左派为名，将民族学院红卫兵总部的负责人郑仲兵扭送到公安部，公安部竟然收下，并将其关押了13天。

“公安部某负责人”究竟是谁？作为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如果没有经过他的同意，是不可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办公厅秘书处”的名义印发这样的文件。所以，对于“某负责人就是谢富治”的说法，我们是毫不怀疑的。

这个文件是如何炮制出来的？它有什么背景？我们至今不得而知，但这显然是一个非常荒唐的文件。刘郅是一个司局级官员，洪涛等也都是中年人，并非少不更事的红卫兵。他们如此大规模地抢劫国家机密档案，其目的是什么？幕后推手又是谁？我们也不得而知。但很明显的一点是，他们绝不是奉无产阶级司令部之命保护档案的。

“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不仅荒唐，也非常愚蠢，它暴露了“公安部某负责人”和坏人勾结的真实面目。历史证明，谢富治和王、关、戚，其实是一伙的，“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就是他们公开勾结的宣言。后来在组建北京市革委会的时候，他们有进一步的勾结。吴德晚年在回忆录中曾揭示，北京市革委会的许多重要岗位，都被“学部联队”的人甚至吴传启所把持。

“1·15”事件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对此事件的不同看法使统战民委系统分裂成两派，在北京，按系统分裂的这是第一个。

在“1·15事件”的问题上，我和北大的许多同志都不能接受“公安部某负责人讲话”，并开始对谢富治产生了看法。

#### ◇ 三月整风

根据中央精神，凡是参加夺权的学生都回到本单位搞斗批改，在斗批改前要总结工作，一边战斗，一边整风。北大和其他学校一样，也开始了内部整风。

1967年3月3日哲学系教师郭罗基贴出《新北大要整风、聂元梓要第一个整风》的大字报。大字报揭出了我涂抹录音带的事，在校内引起强烈反响。3月5日，我在对全校师生员工的讲话中说：

衷心要求同志们帮我把风整好，同志们严格地要求我，尖锐地批评我就是对我的关心，就是支持我，真正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则要做到“言则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应当相信群众，同志们之间也要相互相信。如果同志们这样做，再加上我个人主观上的努力，就可以不成为昙花一现的人物，只有这样才能维护毛主席树立的这面红旗。

对郭罗基同志的大字报我表示欢迎，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很好地考虑他的意见。郭罗基同志在国际饭店会议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斗争中对我有帮助。我愿意听郭罗基同志对我更深刻的批评。

在整风中要做到畅所欲言，大家思想要更活泼，通过整风使我们生气勃勃。我们对敌人要狠，对同志要有良好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形成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如果给对我提意见和提错意见的人扣大帽子，我就对同志们提出意见；如果我对给我提意见的态度不对，也请同志们对我提意见。

北大是烂掉的单位，黑帮是一小撮。犯了严重错误和犯了错误的干部是比较多的，但愿意革命的是多数。四期社论对我校是完全适用的。抓反动学生一定不能扩大化，要严格区分两类矛盾，证据确实的现行反革命可处理；不是现行的，有敌我性质的，放在后期处理；只有一些严重错误的，要团结——批评——团结，作为内部矛盾在整风中多帮助一些。以后再发生乱抓“反动学生”的事，干的人负责。

关于修改录音带的事情，起初我没有承认，后来我发表广播讲话承认修改了录音带。我对这件事情的错误处理，伤害了一些人，降低了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一些战友开始和我分道扬镳。

#### ◇ 干部问题

1967年2月23日《红旗》杂志第四期社论“必须正确对待干部”发表后，我反应迟钝。孙蓬一当时曾提出大批解放干部的观点，没有得到我和大多数常委的支持。我身边的一些同志，曾建议我要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人，尤其像老干部戈华、戴新民、张侠等，他们都是社教时期的左派，是很有经验的老干部。我当时头脑发热，没能听取这些善意的建议，这对后来校内的分裂造成了一定影响。现在想起来，我感到十分懊恼。

另外，运动初期一些干部和学者对前途感到渺茫，走上极端的道路，自杀事件时有发生。我当时如果能大力公开宣讲政策，让他们要相信党，运动后期会正确处理的话，自杀的情况可能会减少些。武斗期间，一些曾经反对过我的干部被新北大公社的人抓起来而受到虐待。这些，我都是负有领导责任的。

#### ▲ 周培源

周培源是北大副校长、老教授，社教运动时也是左派。文革初期他没有列入黑帮。校文革曾委派他主持汉中分校的工作，是校文革结合的干部。周培源和很多善良的人一样，当时想不通也要“紧跟”，也试图积极参加文革。这是文革中相当普遍的现象。

1967年3月27日在校文革举办的干部亮相大会上，周培源根据自己当时的认识水平，做了一个认真的自我检查（全文参见文献集）。周培源说：

1966年12月间，我离开北京去653工地时，曾给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常委写了一封公开信，向常委提了意见，要求他们开门整风，以便领导好两条路线的辩论。当时正碰到两条路线斗争十分激烈的时候，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正在猖狂反扑。这封公开信被阶级敌人利用，来围攻以聂元梓同志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长了资产阶级威风，灭了无产阶级志气，所以起了很坏的作用。

校文革是无产阶级的政权，执行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学校中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代表人物是孔繁、杨克明。井冈山、红联军等反校文革的斗争，就是一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搏斗，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猖狂反扑，他们向校文革开火，归根结底为的是进行反革命夺权，他们进而还反中央文革，恶毒攻击我们敬爱的毛主席和林副主席。所以广大革命派与井冈山、红联军等反动组织的矛盾是敌我矛盾。但这些人赤裸裸的向校文革夺权是不行的，所以他们狡猾的披上所谓“造反派”的外衣！

正因为我错误地估计了阶级斗争形势，在这学校两条道路斗争实际上最激烈时刻，提出了校文革工作中的一些缺点，要求他们整风等等，这就完全被阶级敌人所利用，在客观上就成了这些反动组织、反动分子向校文革进攻提供炮弹，给校文革的工作带来困难，给同志们在思想上也造成混乱，给我校运动带来损失。实际上，自己立场没有坚定地站在毛主席革命路线一边，想到这些，心情是很沉痛的。

1967年4月北大开始向吴传启等人发起进攻，实质上就是向王力、关锋所代表的势力进攻。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把核心机密盘托出，更不能公开打出反王力、关锋的旗号。当时群众批评“地下常委”决定大事，一些事情校文革的部分常委也不清楚。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对我的工作有意见，加上陈伯达6·5讲话的大棒，周培源先生等人做出反对我的决定，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7月1日他和134名干部发表了一个《致革命和要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说“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我的错误是，在他上山并成为井冈山兵团的第一把手以后，没有全面的评价和考虑，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纵容有些人发表文章，说他是反共老手。

#### ▲ 崔雄崑

崔雄崑文革前是北京大学教务长，中共北大党委常委。文革中，他和周培源等人都是校文革要结合的干部，崔雄崑任校文革“斗批改委员会”负责人。1967年12月30日晚，崔雄崑被井冈山兵团从家中抓走。1968年1月6日井冈山的《新北大报》发表《坚决打倒崔雄崑，狠挖17年黑线》的文章，说崔雄崑“伙同刘邓黑司令部，配合彭、罗、陆、杨反党集团残酷迫害林副统帅。”该文写道：

林副统帅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长期以来，林副统帅为捍卫毛泽东思想，和刘邓黑司令部作了英勇的斗争。因此遭到刘邓彭罗陆杨等一小撮党内最大的走资派的残酷迫害。他们逼林副统帅“让位”，给林副统帅投寄匿名信，企图从精神上，身体上摧残林副统帅。他们甚至不择手段地对林副统帅的亲属下毒手，以达到他们迫害林副统帅罪恶目的。崔雄崑积极参与了这些反革命活动。正是他，伙同陆平残酷迫害林副统帅的女儿林立衡同志，把她赶出了北大，积极地配合了刘邓、彭罗陆杨迫害林副统帅的罪恶活动。

林立衡同志是64年春天到北大中文系来学习的。在中学时，她就备受一小撮走资派的排挤打击，几度被迫转学，身体很不好。到了北大后，她断断续续请了几天病假。但在病中仍坚持补课。叶群同志64年写了一封信给北大，说明了林立衡同志的情况。希望林立衡能继续留在北大学习。叶群同志的这封信，崔雄崑是知道的。

但是，党内走资派，三反分子崔雄崑怀着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刻骨仇恨，勾结陆平利用他教务长职权对林立衡同志下了毒手。

当林立衡同志请病假还只有四周多一点的时候，中文系打报告向崔雄崑请示处理办法。崔雄崑在报告上恶狠狠地批示道：“我意按规定办事，该休学就通知休学，否则对本人也不好！”

本来按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的规定，教务长完全有权处理学生的学籍问题，但崔雄崑为了在陆平面前显示自己反革命立场的坚定性，却破例地把林立衡同志的问题向陆平请示。陆平和崔雄崑原是一丘之貉，他提笔就批道：“应按规定办事。”

就这样，林立衡同志被赶出了北大。

崔雄崑勾结陆平，残酷迫害林立衡同志，紧密配合刘邓黑司令部疯狂迫害林副统帅，这是旧北大发生的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

1968年1月15日《新北大报》（俗称“1·15小报”）又发表文章，相当详细地指控“迫害林立衡”事件。说林立衡办休学手续，是一九六四年刘邓“篡党、篡军、篡政”计划的一部份。文章还说，林立衡神经衰弱、失眠，是“反革命集团”造成的，为了“从政治上、身体上、精神上甚至从亲属身上迫害林副统帅，以达到他们搞垮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罪恶目的”。文章再次展示了北大教务长崔雄崑在中文系有关上报材料上的批语：

我意按规定办事，该休学就通知休学，否则对本人也不好。

崔雄崑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文章紧接着发挥：崔雄崑要破例地请示陆平，不仅表明逼迫林立衡同志休学，已不是一般的学籍处理问题，而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反革命事件。陆平批示道：“应按规定办事。”文章写道，“这两个混蛋就是这样一唱一和，狼狈为奸。就这样林立衡同志被万恶的陆平黑帮和三反分子崔雄崑赶出了北大。”

“1·15小报”泄露了林彪家庭人员的情况，我和校文革的一些人看到小报后，发现问题，赵建文随后从报童手中买了两份1·15小报，装在信封里，通过机要交通将其送往中央。中央委派杨成武处理这件事。我和北大的几个人参加了他召开的一次会，参加这次会议的还有谢富治、汪东兴、丁国钰等。因为我们不了解上层的斗争情况，所以没听出杨成武的讲话有什么问题；而谢富治、汪东兴却可能是发现了什么。林彪3·24讲话中说“他为了一个问题，跟着几个同志去找聂元梓，他讲错了话，讲了坏话，可是事后他赖账，他说他没有讲”，可能就是指“1·15小报”这件事。

1968年9月下旬，由工军宣队领导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全校干部和教师被命令集中食宿，不得自由回家。在宣传队提出“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的思想指导下，全校相继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崔雄崑也成为被打击对象。至于工军宣队给崔雄崑到底定了什么罪名，我不清楚，但可以肯定地说，罪名很大，他承受不起而失去了希望。1968年10月16日晚，崔雄崑从“清队”集中地28楼出走，在北大红湖游泳池自杀，时年49岁。

□ 摘自聂元梓：《我在文革漩涡中》，香港中国文革历史出版社2017年出版

~~~~~

【编读往来】

读者指正

• 栗奇程 •

《华夏文摘增刊》第一一二八期（zk1805d）刊发的丁向阳《文革的牺牲品王建鑫、周善丰》一文中有如下一节：

“当时在西单的大木仓胡同有高教部、教育部两个部，但两个部在一起搞运动。高教部有以卢正义、徐非光为首的‘延安公社’，教育部有以中下层干部和工人为主的‘北京公社’。”

此段记述不确。

当时原高教部的对立两派分别是“延安公社”（得到中央文革支持的“老”造反派）和“北京公社”。后者确实由中下层机关干部组成，其中多有解放后大学毕业的“三门（指从家门到校门再到机关门）干部”。

当时原教育部的对立两派分别是“革联”（初称“赤卫队”，又改为“八一八红卫兵”，再改为“革联”）和“五七公社”。后者确实颇以部机关各部门中的工人为出头出面的主力。

两部在同样一大院和大楼内，“延安公社”和“革联”与北京高校的“地派”同流，“北京公社”和“五七公社”大致应属“天派”。

《华夏文摘》如有志做史料备存工作，自宜尽力保证史实中每一细节的准确。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